

古畧人列傳

赫里歐

愛多亞·赫里歐(Edouard Herriot)——一八七一年五日出生於法國香賓省脫羅哇(Troyes)城。祖上世代爲軍官，父親冉·佛朗梭·赫里歐(Jean-François Herriot)曾任過步兵大尉，雖屬一介軍人，却酷嗜文學。當小赫里歐幼時，他的父母都希望他將來成爲一個武官。他同時染受宗教的影響亦頗深，因爲他的伯父就是一位加特立教的牧師。赫里歐幼時從伯父學習拉丁文，十五歲時進了中學文科的最高班——修辭學班(Cours de Rhetorique)，在校成績頗爲優異，得總視學的獎掖，以免費生資格進了聖巴勃中學。畢業後即送至巴黎高等師範讀書。不久，父親去世，家道更加式微，他的母親很耐心的工作着，供給全家的費用。那時赫里歐所進的學校是不花錢的，他得以致力於學業。三年後以第一名畢業於高等師範，對於宗教史有着特別的研

究。在入伍期間，寫了一本很重要的研究宗教的著作，並得到獎金。畢業後在朗特中學執教鞭，不久即升爲里昂中學修辭班教授。他對於政治本來很感興趣，以前常在報上發表政論文字，及至來到里昂後，更加入急進黨的地方分部。

當時在法國發生了一件鉅案，就是有名的『德雷斐斯事件』(Les Affaires Dreyfus)事件的經過是這樣的：有一個猶太系人法國軍官名叫德雷斐斯(砲兵上尉)，因被控私通敵人出賣軍事機密而被捕，被軍法處判處終身流刑，流放到幾內亞第亞坡兒島。然許多人認爲這事全是冤枉，特別是猶太人對此案大鳴不平，於是這事態逐漸嚴重化，轉成爲嚴重的政治糾紛，全歐爲之震動。此後更因此引起了法國的排猶運動。一時法國文豪如左拉、法郎士等都出來主張公道，極力爲德雷斐斯伸雪，赫里歐也是其中最出力的一個，後來終於使此案水落石出，德氏得無罪開釋。赫里歐生性喜爲別人鳴不平，嫉惡如仇，尤爲他的天性，雖然他始終脫不了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與溫情主義影響。

赫里歐不是一個社會革命者，甚至連社會改良家都說不上，可是他却是法國一代罕有的

大政客與大政治家。他在急進黨的地位日益增高，後來成了社會急進黨獨一無二的領袖。急進黨社會黨是代表法國的中等階級的，在法國政治界中，是屬於所謂『左黨』(Gauches)，自從赫里歐爲領袖後，它的勢力日益強大，頗得法國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的擁護。

一九〇五年赫里歐當選爲里昂的市長，他的聲望由是更爲雀起。里昂是法國一個極重要的工業都會，其地位僅次於巴黎。由於赫里歐做了市長，急進黨社會黨在法國的勢力更爲壯大。此後赫里歐接連當了二十八九年的市長——真是一個老市長啊。

一九〇七年急進黨社會黨在朗西(Nancy)開全會，赫里歐宣讀黨的宣言，在黨內的地位更抬高起來，兼之他善於詞令，發言清晰，易使人感動，頗能博得不少人的喝彩。一九一二年他代表黨進了上議院，在歐洲大戰時，他雖然不明白反對戰爭，可是他對於那些消極的非戰論調有時是很同情的，有一次他承認歐戰時代是一個最黑暗的時代。不過他全是站在愛國的立場上對戰爭表示不滿，對於革命的反戰運動——即以革命戰爭消滅帝國主義戰爭的運動，却不贊成。實在說來，當時法國的社會主義者有許多已變節而爲帝國主義戰爭的擁護者了，赫里歐具着

濃厚的資產階級民族意識，自然不能希望他成爲一個積極的反戰論者。事實上，在白里安的戰時內閣時代（詳本書『白里安傳』），他已在中樞政府擔任要職——路政、轉運與軍需部長，他顯然是帝國主義戰爭的幫助者，雖然他有時亦會流露對於戰爭不滿的情調。

就在歐戰結束的那一年，在法國又發生了一次與前述的『德雷斐斯事件』齊名的事件，即是所謂馬爾偉事件（L'affaire Malvy）。馬爾偉在歐戰時期，是任內政部長的，他曾發不滿於戰爭的論調，一九一八年最高法院控他以不忠於共和國，將他逮捕下獄。這事牽涉到赫里歐頭上，當時他一面自己要聲辯，一面還要替馬爾偉辯護，其處境之困難，當可想而知。

一九一九年赫里歐被舉爲急進社會黨領袖，他遂成爲『左派』中的翹楚（實際他的政治頭腦絲毫說不上左，不過通常法人是將急進社會黨列入『左派』中，故此處一仍舊稱。）自此他退出了上議院（Chambre Haute, Senat），改入衆議院（Chambre de Deputes），爲的是衆議院成爲政治的重心。那時右派勢力很強，它們成立了國民內閣，即可謂『國民集團』（Bloc National）。

可是不久左派就有一個大聯合，即社會黨、民主社會黨和急進社會黨在議會中結成一聯合戰線，以對付右派，這個聯合在赫里歐領袖之下實現了，這就是所謂『左派聯合』或『左派集團』(Bloc des Gauches)，當時的衆議院，有左派集團衆議院之稱，其聲勢之浩大，可以想見了。這樣，就促成了第一次的赫里歐內閣(Cabinet Herriot)之實現。不過所謂左派集團隨着法國經濟政治潮流的起伏，是有幾度變遷的。自一九二四年六月至一九二五年四月爲左派集團的全盛時期，過此則漸次式微下來了。後來在法國發生了嚴重的金融風潮，因通貨膨脹的結果，法郎(法幣)慘跌。我們記得在歐戰後，法郎曾有一度暴跌，當時曾因庚子賠款換算問題，引起了中法之間嚴重的『金法郎案』。現在這是法郎的第二次狂跌，(跌到每英鎊換法幣二百一十二個七十五生丁)，就在這種嚴重的金融狂潮之下，赫里歐內閣終於倒台了——時在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七日。但赫里歐毫不自餒，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九日他又試作第二次的組閣，當天宣讀政策，就爲衆議院提出不信任案推翻了。一九三二年六月四日第三次的赫里歐內閣建立起來了，約莫有半年之久，亦被推翻。

自一九三二年入冬以來，赫里歐不復參加內閣，而且急進社會黨的領袖位置已由達拉第（Daladier）繼承了。但他依然不失爲法國政界很負時望的代表人物，他對於法國政府仍有直接的幫助。此後他專門從外交方面展布其才幹，一九三三年三月間在美國俱樂部席上作關於戰債的半官式的演講，表示要美國允許修訂債約，同年四月二十二日赫里歐代表法政府赴白宮與美總統羅斯福商量倫敦經濟會議的各種先決問題。至九月間又到蘇聯去考察，這顯然是啣了政府之命和蘇聯在外交上、商業上與航空上謀成立一種協調，以對抗法西斯的德國的，這亦可說是蘇聯和平外交的勝利，最近（一九三四年一月十日）成立的法蘇商業協定（Pact Commercial Franco-Soviétique）和赫氏此行，不無相當關係。赫里歐一到蘇聯，即受到了蘇聯當局的歡迎，隨即有法國的航空總長谷特率領飛機隊飛訪蘇聯，這實在具有重大的政治外交意義。淺識者流，以爲這是戰前法俄協商的恢復之預徵，固然是極端不正確的，可是法蘇親善能夠暫時控制反蘇的勢力，拆散干涉蘇維埃的聯合戰線，亦是不用說的。赫里歐回國後，對於蘇聯建設的印象很好，到處演講盛稱蘇聯的進步，不管這是否出於真意，可是由此倒可以窺見法蘇

的邦交之一班了。

去年（一九三三年）十二月間法國薩勞內閣倒台，法總統勒白倫頗有意要赫里歐重組內閣，赫氏以病告辭，後來始由前內務總長旭丹出來組閣。赫里歐被派出席日內瓦國聯的總代表。赫里歐不只是一位傑出的政治家，在文學著述方面亦頗顯示其出衆的才能，甚至對於藝術也有很深的造詣。他在里昂高等師範畢業後，本來希望當巴黎大學的教授，無奈他當時的資望尚不夠，這使得他發憤於著述。後來在里昂大學教授文學史，將自己的講義加以整理及補充，作成了一部法蘭西文學史大綱（*Le Contour de l'Histoire de Littérature Française*）。而他的傑作乃是悲多汶傳；爲了著這部傳記，他特地跑到德國悲多汶的故鄉，去訪問專家，參考遺書。此外尚著有其他好些著作，如海洋之門（*La Porte de L'Océan*），歐洲（*L'Europe*），創造（*La Création*），新俄記（*La Nouvelle Russie*）等等都是他的名作。

赫里歐又是一位天才的雄辯家與演說家，他的演說最能感動羣衆。最近法國發生了一次重大的騙案，就是巴央納典質銀行（*Crédit Municipal de Bayonne*）弊案，即所謂史達維斯基

事件(L'affaire Stavisky)在巨騙史達維斯基『自殺』(?)後(實際恐怕是警察祕密槍殺的，因為這巨騙擁有許多牽涉到官場的證據)在法國議會有一度左右兩派的激辯，代表『左派』的赫里歐和代表右派的泰迪歐(Tadiou)彼此舌劍唇槍各不相讓。泰迪歐性情暴躁，而赫里歐却從容不忙，應付裕如，使泰迪歐不得不『拂袖而起』者番辯論，煞是好看。

赫里歐雖然幼時受宗教影響頗深，但他是反對宗教干預政事的，他堅決主張政教截然分開，而將教育權劃歸政府所有。當右派得勢時，米勒朗(Millerand)大總統主張在巴黎接受羅馬教皇派來的公使，同時由法國派一公使到教皇那邊去。赫里歐在議會大加反對，但是無效，直到他組閣，握了政權，才得實行他的主張。

赫里歐生平頗崇拜若累斯(Jean Jaures)的為人。若累斯是法國有名的社會主義者，在上述的德雷斐斯事件中，他就是熱烈的替德氏辯護的一個，他曾創刊人道報(L'Humanité)即今日法國共產黨的機關報。世界大戰時，他是積極反對戰爭的。一九一四年他在一個酒館，給國粹派人暗殺了。赫里歐雖然崇拜若氏，但他在思想上總和社會主義的思想不相容。他以爲人類

一天一天進化，自由的勢力自然日益進步，只要現在的勞工地位與尊嚴逐漸增高，自然不必取消私有財產，『因爲人家決不願取消的。』他在急進黨綱領中宣言：『無論怎樣，總有一部的財產爲人們不願拿出來共有的，每一個人總願私有他的食物，他的衣服、書籍、器具，爲何不許私有他的房屋呢？』顯然地，他是擁護私有財產制度而反對社會主義制度的。他是法國資產階級思想之最好的代表。

最近（一九三四年一月間）旭丹內閣因法國兩次舞弊案而實行總辭職，赫里歐組閣的聲浪又很高。當旭丹辭職後，赫里歐與右黨領袖泰迪歐均先後晉謁總統勒普倫，不久他即以沉默態度出總統府。總統與參衆兩院議長會商的結果，是以總揆席界赫氏，赫氏定然是辭謝的，因爲他深知在目前紊亂的政局下要建立一個長命的內閣是頗不容易的，而且他的現有地位與聲譽決不比入閣後更低微。現在內閣總揆恐怕以達拉第希望最大。

現在這位雄辯的政治家依然健在，此後他是否會在思想上轉向呢？這固然很難回答，不過以他所處的地位而論，以他過去的歷史而論，大約至多只能繼續做一個法蘭西共和制度的支

持者吧。

世界偉人列傳

一〇

甘地

被稱爲『聖雄』的今日印度不合作運動領袖甘地 (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 以
一八六八年十月二日生於印度之古吉拉省 (Gujerat) 波爾班達 (Porbandar) 地方。他的祖先
歷代都信奉耆那教 (Jain)。祖父曾任過高等的財政官職，父親也是一位財政大員，因失歡於國
王，便掛冠而去。後來又因國王諒解他，遂恢復了官職，而且得了許多獎賞。生平爲人剛直豪邁，頗
有不屈不撓的精神。在濃厚的宗教氛圍中生長的幼年時代的甘地，曾經有一個時期懷疑過宗
教。他家所信奉的宗教——耆那教本來是以戒殺素食爲主要的信條的，有一次——那時那還
在學生時代——因受同學的影響，偷偷地買肉吃，並且看不起祖先們的拜神習俗，以爲是背理
違時的。後來他的胃口變壞了，父母要查問根源，他只有捏造了許多謊話搪塞。但是他漸漸覺得

說謊很使他內心不安。爲了力戒說謊，他就決意不食肉，以後他染受宗教的影響很深。還有一次他瞞着家裏的人將他哥哥的一塊金子偷去買紙煙吃。但偷過之後，立刻後悔，他便寫了一紙自供狀給他父親，他的父親竟給他感動得流淚。

印度是盛行早婚的國度，甘地當然不能例外。他在八歲便定了婚，十二歲即與迦士圖兒貝（Kasturbai）女士結婚。這對小夫婦因爲孩子氣太重，常常不和；甘地對於他的夫人管得很嚴，時常限制她的行動，而他妻子却是一位歡喜自由的女子，對於甘地的管束，很不以爲然。甘地常歡喜以自己的所學去教他的夫人，却遇着種種的困難。但實際上他們倆的愛情是很好的。她的夫人迦士圖兒貝女士能和丈夫同休共戚，和甘地一樣，一生只穿手織的衣服，並幫助甘地在民衆間推行手織機運動，及作解放巴里亞（賤民）的活動。

甘地少時對於繁難的梵文頗不感興趣，想中途丟棄不學，改習波斯文，可是他的祖父責備他，說他不能拋棄祖宗的文字，否則就是忘本。甘地不得已，後來才把梵文學好了。

一八八七年在中學畢業，在一個印度大學旁聽，覺無甚進益，他便往倫敦留學，學習法律，同

時研究宗教。一八九一年他受法律考試完畢回國；一到故鄉，才知道他母親已去世多久了，他異常悲痛。他住在孟買，便做起律師來，直到後來，他才拋棄了這種職業。

一八九三年甘地往南非洲去，看見許多僑居此地的印度同胞受異族的壓迫侵凌，頗爲悲憤，他替印度人打官司，不久將他的夫人接去同居。他雖然盡力救援同胞，但是印度人的痛苦，絲毫不能解除。甚至有一次，他自己在荷領脫蘭斯哇，亦備受毆打凌辱。他本想回國，忽聞南非政府有提案削奪印人選舉權之訊，便打銷歸志，開始了所謂『文明反抗』的鬭爭，一方用精神的靈力，而政府方面則用頑強的武力。甘地雖富於熱情，可是他的認識和策略完全不正確，使他走上了消極的『非暴力抵抗』之路，這便決定了他的失敗。

其後，甘地復創辦印度輿論報，用英文及三種印度語言發表。一九〇四年，他仿托爾斯泰的辦法，在都朋附近福尼克斯地方，創辦農村公社，招集國人，分地耕種。一九〇八年，納塔耳土人叛變，他加入馬隊，頗著功績，因此曾屢次被捕入獄。但甘地並不因此稍挫其志，他於一九〇八年出版印度自治論一書，便是他對暴力的表示。

此種爭鬪，前後互二十年，至一九〇七及一四年間乃益趨激烈。一九〇六年時，政府方面不顧一切，悍然通過新亞洲移民律。於是甘地覺事不可緩，遂起而作大規模的無抵抗團體的組織。九月，在嘉納斯堡舉行大示威運動，聚集全體印人，誓作消極的抵抗。

當一九一四年大戰勃發時，英人方面高揭『爲正義而戰』的大旗，一面復用種種手段來誑惑印人以求他們的援助。一九一七年，印度事務大臣蒙太古恢復印人得有對其人民負責的政府。甘地亦爲所愚，致印度人民俱爭先恐後，效其死命。此次戰爭，印人犧牲生命的，多至九十八萬五千人。

一九一八年之末，英人以戰事終了，危險已過，竟完全露出帝國主義的真面目，連印人本來僅有的自由都要剝奪。印人忍無可忍，遂起而反抗。甘地便是他們『消極抵抗』的領袖。

許多印度民衆受甘地的潛力所移，忽然發生極活躍的政治動作，一九一九年四月六日都聯合起來，作一個極有力的示威抵抗。全年發生總同盟罷工，附以宗教式的慶祝。不過這次的示威，是整個的在法律和秩序之內的，除了德利有多少鬧事之外，並沒有什麼激烈舉動便過去了。

但是甘地一聽見德利鬧事，立刻就往那裏彈壓他們，因為他是反對暴力抵抗的，可是政府依然不放過他，在半路就拘捕他，解回孟買。

甘地的不合作運動事實上已證明不是印度羣衆反英帝國主義的出路，這只能緩和羣衆反帝的情緒。不過他却有一個雄心，就是企圖將數百年在宗教信仰上水火不相容的回教徒與印度人聯合起來，在這一點上他固然是對的，可是在另一方面他却忘却了羣衆之階級的分化。爲要達到印回二教的人合一的目的，甘地在亞米達巴德設立一個印度大學，教學生們熟習亞洲的語言文字，亞拉伯文、波斯文、梵文。他在「少年印度報」上寫道：『我的大學不但要使學生享受或祖述各種古代學藝，而且怎樣創立一種新學藝，以往古的知識傳統作根基，以後代的淵博經驗使之豐富。他的意思是要綜合留傳於印度的全數不同的學殖。凡是曾經潛移印度生活，又轉而受印度學殖精神所潛移的，都在綜合之列。……這個大學只排擠一件事，不許永久專注意於人類福利區域內任何一事，而不顧其他……』

甘地這個大膽觀念，打破印度的往前所有一切的根深成見，聯合奉印度教的和奉回教的

於一個公共舉動，無怪這兩教的人不能一致，而且在幾個區域內，發生反對。

受甘地指導之下的全數印度黨派，作一致進行的舉動，曾使英國政府讓步。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政府宣布大赦政治犯，通過一條改革議案，給印度人在中央政府及在行政分所幾樣重要權利。甘地又願意長久的保持和平，所以承認英國的各種提議，在國民大會裏通過。

一九二〇年，甘地不能不最後的同英政府分離。提拉克死後，印度人普遍承認甘地為印度國民黨領袖，那時候剛曉得土耳其的慘酷和約條款，這條約完全暴露帝國主義侵略弱小民族的面目，土印二民族幾處於同病相憐的狀態中。回教人覺得這樣不公道的待遇土耳其，傷害他們的宗教情操，同時奉印度教的人以在安立查亂殺無辜的軍官們，竟不處罰，是一件重大羞恥。這兩大教派的人們，聽甘地的說話，決定聯合為一，實行「不合作」。

甘地有一篇致在印度的全數英國人書。我們從這一篇文章裏，更能易於窺見他的理由為什麼要發起不合作的舉動。他的策劃的整個精神，很清楚的表現於這本小冊中。

甘地的民族主義，其間並無什麼元素，有如西方諸國的多數民族舉動那樣恐嚇和平。他的